



学者笔耕犹如农人,脚踏实地辛勤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访谈

杨剑龙, 蒋进国

杨剑龙(1952-),上海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带头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当代文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老舍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等,著有《旷野的呼声》、《放逐与回归》、《现实悲歌》、《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论语派的文化情致和小品文创作》、《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乡土与悖论:鲁迅研究新视阈》等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篇,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金牛河》。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等。曾四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奖、上海市模范教师等。

蒋进国(以下简称蒋):今年是您从教30周年,我读过您的长篇小说《金牛河》和知青生活散文,想请您谈谈知青生活对治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学术研究的转变历程。

杨剑龙(以下简称杨):我18岁离开上海赴江西农村插队,近六年的时间里,我在农田里耕耘,在山上砍伐竹木,在激流中撑排,在大山里修水库建公路,也曾山村小学教书。可以说知青生活影响了我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农村给予我最大的启迪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生活的经历是一种资本,阅历知书

味,艰难洩世情,经历了艰难与坎坷,才能更深入地评品书味,才能更真切地了解世情。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因成绩优异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在讲授写作课的几年里,我逐渐提高了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能力,这为我后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81年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1984年,我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跟随曾华鹏、李关元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开始真正走上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我们这一代是被历史耽误了的一代,但对人文学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起步的时间,而是前进的过程,人

收稿日期 2011-01-18

作者简介 杨剑龙(1952-),上海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蒋进国(1980-),河南固始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学科的研究历程是一场马拉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总会取得成就。1996年我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跟随王铁仙教授在职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被获准提前一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当过知青的我,少了一点不切实际的空想,多了几分脚踏实地的精神,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用一种认真踏实的态度去对待,碰到任何困苦,都能以任劳任怨的精神去克服。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秉承农村插队养成的脚踏实地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就是我的生活信念、也是我的学术姿态。

我最初想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题是在构想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因为当时我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发现了这一文学现象,但由于思考还不完全成熟,我就以《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综论》为题做硕士学位论文。可我并未放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题的研究,后来一直在阅读有关基督教文化的资料和著作,一直在研读有关的文学作品,1998年便以此论题申请博士学位。国内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学研究方法热,借助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原型批评等研究方法,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拥挤,国内众多学者挤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范畴里,出现很多研究话题重复的现象,研究者开始由当初的发掘边缘作家和被冷落的社团,转而进行文学制度、文学出版、文学期刊、文学会议、文学场域等研究。新世纪前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以及国内消费文化的盛行,网络文化、都市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有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直接跨入文化学研究领域。1998年12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在文学研究方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蒋:不过我注意到,您现在又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研究转移到都市尤其是上海文化的研究,您能谈谈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吗?

杨: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不同学科融合的方式展开研究,往往就会有新的发现。例如,文学研究者如果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往往会开拓出新的境界。在与朋友们交往中,有不少朋友对我的褒奖是“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这对我的触动却很大,我在反思为何人们会如此评价上海人?上海人身上存在着哪些长处与短处?原因何在?这与上海文化有何关联?我撰写与发表了《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一文,我

从文化与文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从文化的背景观照文学,从文学的视域研究文化。我开始认识到,研究上海,尤其是研究上海文化,不但会为已有的现代文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而且会为自己打开另一扇学术窗口。

多年以来,学界一直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众说纷纭,我比较认同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观点,就是文化研究是扩展文学研究学科领域的一种方法,而不能将文学研究最终泛化为文化研究,本体的文学研究还应该最终落实到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研究,还是应该落实到文学的本体,即作家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我们可以借鉴思想史、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但是不能把文学研究简单化地变异成为别的学科,那样的话文学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就被解构了。另外,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能因为注重跨学科的研究而迷失自我。对于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我曾经组织研究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就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就如何展开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等问题进行讨论,由我整理的研讨纪要《文化热中的文学研究》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3年第6期转载。

蒋:也就是说,研究者要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分野保持清醒的认识,那么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其历史脉络和学科定位是怎样的?

杨: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历史久远,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探讨英国无产阶级城市生活了,只不过他们没有预见到人类社会有如此迅速的都市化进程罢了。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了芝加哥都市社会学学派(the Chicago School),他们认为都市生活是一种更加具有刺激性和异化特征的生活方式,都市应该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二战后,西方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发展迅速,60年代都市社会学在美国逐渐走向鼎盛。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都市化进程,国内都市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纪之交才逐渐引起重视。如果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诞生作为国外都市文化研究的正式开端,国内研究的起步则晚了大约半个多世纪。

都市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理论研究方面,西方走在东方的前面。首先看国外,西方的都市文化研究是一个内生学科,没有学者刻意提出学科建构。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都市化已经完全改变了

人类的生存方式,任何传统学科都无法忽视都市生活的存在,历史学家要研究城市史,人类学家要研究人类都市生活,心理学家要研究都市人的心理现象,甚至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文化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詹姆斯(Jonathan Hillman)等学者都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国外的“都市研究”涵盖都市社会学、都市建筑学、都市人类学、都市史学、都市地理学等众多学科,“文化研究”涉及网络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媒体文化等众多方面。有一点必须承认:“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西方乃至国内学术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

再看国内,应该说我们尚没有都市文化研究学科准确的定位。首先因为都市文化研究既不是本土学科,又不具备充分的学科独立性,它源自西方“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叉点,而“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本身的学科界限也不明显。其次是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整体上尚属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体系、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不足以支撑一个新兴学科。所以早在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们就一直有意识地在进行学科建构工作。众所周知,由于上海飞速的发展,国际国内关注上海、研究上海已使上海成为焦点,可以说“上海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上海师范大学组合中文、历史、法学、伦理学等学者,建立了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专门从事都市文化的研究。2002年上海市教委在我校设立了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我被聘为特聘研究员。2004年由我领衔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同年年底被教育部批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成立,使我们的研究有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我们每年申请设立两项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目前已被教育部批准设立了12项重大研究项目,我们每年主办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国际学术会议,逐渐在国内外产生了一些影响。

蒋:这样看来,国内都市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后发”学科,不过“后发”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路径。请问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路径对国内学界有哪些启示?

杨:要归纳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路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都市文化是涵盖面十分宽广的跨学科领域,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出现都市文化的准确定义。但总体而言,国外都市文化研究有两个潜在路径,一个是跨学科衍生,一个是空间文化哲学。前者刚才

已经涉及到,后者正是国内所欠缺的。都市文化其实是一个文化空间概念,而西方学界对空间文化哲学一直予以持续不断的关注。国外都市文化研究之所以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步深入,主要得益于丰富的理论资源。西方一直有着理论思辨的传统,学者们对前人的理论体系一直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他们往往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理论体系。这里首先必须提到列斐伏尔,他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空间理论,不仅成为空间地理学和都市规划学的主要灵感来源,而且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的英语世界产生巨大反响。随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也提出要打破特定的历史主义的局限,从根本上开放空间的想象。80年代后兴起了后现代思潮,詹姆斯又提出重建都市空间话语。后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论,但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反对,他提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说。表面看来,学者们的观点相互矛盾,但是这种理论乱象,正是后现代思想的表征,也是西方都市文化丰厚的理论源泉。

国内外都市化的发展阶段存在时空错位,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进程中,学界首先是译介消化国外理论成果,然后有意识地进行学科体系的建构,继而转向本土都市文化研究。在国内,都市文化研究作为拓展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将其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一定会招致学界的某种质疑。具有学科远见的学者们一面将国外的成果引进过来,一面从学理上寻找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当然译介也是一种研究,因为遴选和甄别国外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体现了译介者敏锐的学术眼光,译本的传播也会增强学科影响力。包亚明先生在2001年推出了“都市与文化”翻译书系,将福柯、列斐伏尔、索亚等学者的专辑译介入国内,继而又主编“都市与文化译丛”,引进拉雷恩(Jorge Larraín)、迪尔(Michael J. Dear)等人的经典著作。此外,孙逊也主编了一套“都市文化研究译丛”,推出肖特(John Rennie Short)、秦亚克(David B. Tyack)等八位学者的专著。我们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编了《都市文化研究》学术刊物(以书代刊),以大量的篇幅翻译介绍国外有关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发展现状,已经出版了6期。第二个路径就是学科建构,本中心的几位学者先后对此展开了研究。孙逊从宏观角度出发,阐述都市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为研究寻找当代价值和合法性。我侧重上海文化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开拓学科的全球视野并提供

研究案例,系统梳理西方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们致力于上海与香港、台北、东京、首尔、纽约、巴黎等重要都市的文化比较。虽然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还不完善,但以上在学科范围、概念、价值和范式等方面的努力,已使该学科获得了广泛认可和关注。

目前恰逢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的独特研究语境和开阔的发展空间,这是国外学界不具备的,因为西方社会已经过长时间的都市化,而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过程中对都市文化的建构需求变得日益紧迫。除本中心以外,上海还有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以及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关注都市文化的出版机构,这些条件使得上海成为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高地。另外,北京、广州、西安、杭州等各大城市的都市文化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所以,我对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前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也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一是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尚比较含混。跨学科是一把双刃剑,都市文化研究的魅力之所在是跨学科,其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隐忧也是跨学科。到现在为止,国

内都市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是从文学、历史学、建筑学等传统学科跨界“玩票”的,他们很少将都市文化研究作为持久深入的关注研究对象。所以国内许多都市文化方面的著作实质上是文学、社会学、建筑学、历史学著作,真正像美国都市文化学者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的《城市文化》那样具有都市文化研究学科特色的著作尚甚少。二是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比较单薄,我们不但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阐释框架,而且连国外都市文化的重要理论还没有完全消化,不少学者往往直接套用国外理论,其结果是将本土都市案例降格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自己却往往“失语”了,所以国内学界亟需深化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三是国内学者必须要对本土研究的语境有清醒的认知。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史密斯(David A. Smith)所说,无论是都市化的结构形式、社会后果,还是城市增长轨迹,第三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都大不相同。因为国外研究以高度工业化为背景,而当前都市化热点地区都在传统的农业国家,这些城市人口的无序流动形成恶性循环,诱发了各种“都市病”,这种状况是西方未曾出现的。除了注意中外都市文化研究的不同语境,还要留意我国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某个城市的繁华区和颓败区的发展失衡等问题。不过,新问题会催生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挑战正是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新的生长点。

[责任编辑:周玉林]